

小历史的火光

潘毅

1993年的11月，一场大火吞噬了深圳的一间港资玩具厂，这是一间专门为欧洲某著名玩具品牌公司进行产品加工的分包厂。87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另外五十多人被严重烧伤，二十多人受轻伤。惨剧震惊了国际社会，也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就好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遭受跨国资本的重创一般。大众传媒也仿佛突然之间才意识到，农民工们的确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场大火给中国社会笃信资本和市场的现代性梦想留下了永恒的伤疤。

火，闪现着社会创伤，也映照出打工妹们所承受的来自现有社会、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的三重社会压力，这三者一起创造出一种以阶层、性别和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主体——中国打工妹。

这场大火已过去十多年了，中国打工妹的命运又如何？

为了探索女工生命中无法逃避的社会境遇，我们在中国社会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对接的过程中，踏上了寻找中国打工主体的漫漫长途。现代中国正在迅速地将自己变成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因此，我们曾经尝试在现代中国提出一种女工争取权益的次文体，它所承载的是女工们有声和无声的种种抗争，以及贯穿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每一位打工妹生命之中的争取活动。

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既有希望和渴求的躁动，也充斥着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后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底层劳动者

的牺牲往往被视为发展所必需的。小历史的趣味在于道尽大历史的虚妄，大部分人认为现代化的发展以及经济的起飞所引发的一些恶果（如贫富分化等）是必然甚至必需的，而本书所讲述的小历史将为这种论述画上休止符。

打工主体的生成

“打工”意味着将个体变成工作主体的过程，尤其是在为“资本主义老板”工作的情况下；“妹”则进一步显示出这个工作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性别身份。“打工”一词意指劳动关系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打工”就是“为老板工作”，带有强烈的劳动力商品化或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的意味。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打工妹”和“打工仔”成了两个在中国被非常广泛使用的词汇，与“工人”，即无产阶级，这个在毛泽东时代更普遍使用的词形成对比。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在社会中享有农民阶级望尘莫及的高度特权地位，国家宣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工人是社会主义中国将劳动力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并使其在劳动过程中充分实现自我的新型主体的理想类型。实际上，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人是为国家工作的，国家作为“社会主义老板”，不仅给工人发工资，同时还提供终身雇佣、住房、医疗保障以及子弟教育等福利。总之，它是中国为了改变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

“打工”不仅仅意味着离开“社会主义老板”，而且也意味着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老板们的到来。“打工”意味着劳动者不再受到保护，它是临时性的劳动，会被任意解雇的劳动，并且是随时可能被更低价格的劳动所替代的劳动。打工的价值，如果有的话，是由市场决定的，资本家榨

取其劳动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换句话说,“打工”一词意味着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转变,打工者则是劳动被剥削、具有阶级意识的新的蜕变体。

背井离乡的欲望

要明白打工主体的出现及其抗争的可能性,首先便必须探索打工主体欲望之所在。中国全球化生产时代的到来宣告了打工潮从农村向城市的涌动,工业资本一面熟练地操纵着需求、欠缺和欲望,一面在既梦想成为城市工人,又梦想成为现代消费者的打工者中间将“现代化”神圣化。外出打工的欲望和经历错综复杂,想找寻一些线索弄明白打工者的生涯真是不容易。历史性和个体性相互冲突,相互胶着;我们的着眼处不在于历史性和社会结构性的因素,而在于个体在历史性中的种种挣扎和在种种困境中摸索出路。对于外出打工,我们的理解是源自一种历史性和结构性的欲望,这种欲望把中国农村的新生代一个又一个地送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轨道。书中,秋月把这种欲望说得浅白:“当时同村的女孩子出去打工,出去前穿的衣服都不好看,打工回来穿的衣服却好漂亮,而且皮肤也白了,人也漂亮了,这对我真的有点诱惑哩!”追求生活的改善原本是劳动者普遍性的心愿,女孩子追求身份的转变也是人之常情,只是给“现代化”的大话语套上,国家与资本的欲望,便成为个人的欲望,相互扣连,相互胶着。

欠缺和欲望,为贫乏的农村和富有的城市所滋生的阶级经验相互映照,贫乏的农村恰恰是欲望滋生的温床。慧的父亲是国企煤矿工人,90年代末下岗,家庭经济拮据,父亲在家里种田无法养活一家人,再加上母亲患上脑血管等疾

病,医疗费用昂贵,一次化疗几百元,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无法承担的,一家4口的生活便陷入困境。农村医疗制度的保障不足,已经让无数家庭举债累累,惶恐度日。

没钱治病,父亲的性情变得暴烈,经常打骂慧和她妈妈;慧的妈妈说:“如果不是你和你弟弟活在这个世上,我早就去死了。”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之高,恐怕也不用在此多加注脚。15岁的慧,便渴望逃离家庭,她说:“跑得越远越好,外面的日子会很逍遥。”借了同乡的身份证,慧就头也不回地往城里打工去了。

华的命运与慧的有相似之处,父亲得胃病,家里没有钱动手术,将当初只有6岁的她许配给人;直至华17岁,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母亲才告诉她。华当时已有男朋友,家人极力反对,她只有痛苦地分手。华对父母的安排怀着很大的怨恨,对于男方的迫婚,她别无选择,便只好离家出走。

华说:“那时候我想出来散散心,不想面对所有的问题,想逃脱出来,找一个空间放松自己。”问她出来打工是否能为自己找到一个空间,华这样回答:“其实我没有找到什么,心里很难受。为了那件事,我失去了快乐,活着和死了一样……”

历史所造成的伤痛无法补偿,结构性的裂痕进一步加深,20年的经济发展没有为打工妹的命运带来改变。农村的生活贫乏依旧,进城打工的欲望没有稀释。

中红是一位河南的农村姑娘,属90年代打工潮中的佼佼者,她年轻,不喜欢农村,初中毕业后在城里学计算机,18岁那年,她背上行囊,和其他老乡坐上劳动局的包车,直奔南方打工去。对于像中红一样的年轻人来说,打工为的是逃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

城市打工生活

可是逃离农村，迎接她们的又是怎么样的城市打工生活？入城，受骗，是打工者的共同经历。阿芳第一天到达广州，在火车站旁，等待她的就是一群骗子。骗子当中有男有女，有的要带她乘车，有的硬要她买金链和戒指，有的要向她借钱。受骗的滋味不好受，阿芳咬紧牙关，独自找工去。多少打工姐妹像阿芳一样，她们出来闯世界，这个世界给予她们“最精彩”的序幕却是这些无奈。年轻的心灵受伤害，对人、对城市的不信任就这样产生，而且这种不信任深化着城乡的鸿沟。

相对阿红的经历，阿芳的受骗有点儿小儿科。阿红自幼失去双亲，大哥为她订下了一门亲事。为了逃避婚姻，阿红到镇里打工，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一年后，往宜昌打工的途中，阿红被老乡拐卖，以2400元的价格卖到了安徽的农村。就这样，阿红被迫与没有感情又大她十多岁的穷汉子结婚生子，苦闷的生活逼得她多次自杀，但都未遂。那时，阿红经常做梦，梦到自己回家，跟以前订婚的男子结婚。

出外打工，对许多打工妹来说，是想找寻一个避风港，但社会的无情，制度的压力，工厂生活的辛酸，又让她们跌宕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有希望时，背上行囊，往城里去寻找工作。找到了工作，又发现老板太凶太无理，既不按时发工资，又经常骂人，打工者失去尊严，希望落空。回乡，很闷，无趣，无钱，又让她们蠢蠢欲动，再次往城里去。

芬的经历是典型的这种短暂而又重复的打工历程。她进了一间雨伞厂，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工资是计件的，工作时间特别长，老板又拖欠工人工资，再加上食物不干

净，芬每天拉肚子，工作了二十多天，便撑不下去，于是便决定离厂回家。要求离开时，厂方不愿放人，不发“放行条”给她，保安又很严，芬只好尽量把衣物穿上身，然后在厂旁边的小杂物店把衣服脱下来，又回到厂宿舍里把衣服穿上带出来，就这样，她终于成功“逃出”工厂，连工钱也不要。

阿春说：“回家就想出来，出来之后又想回去。”才20岁的她，已经三进三出。第一次出来打工是1996年，进电子厂，负责剪灯脚，由于厂方没有发手套，手开始起泡发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也没有挣到什么钱便回家了。回家半年，阿春觉得无聊，又要向父母伸手要钱，于是第二次出来打工，进了一间生产VCD的电子厂，是焊锡位，她受不了焊锡线释放出的难闻气味，又跑出来。之后，她和一个朋友开了一间小店，结果受骗。她第三次打工是1998年3月，进了深圳一间印刷厂，每月700元工资。她的工作是将纸放入烘干机过胶，因工序中涉及化学品，如天拿水，所以和其他女工一样，经常出冷汗，经期也不准。阿春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又回到了家乡。

就这样，打工者，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追逐一个又一个破灭的梦。“很累很累”是打工一族共同的语言，在工厂宿舍尖叫依然是女工的无奈的发泄。10年过去了，她们发出的声音仍如出一辙。慧说，尖叫也是一种解脱，好像心里的什么东西都随着叫声一起飞出去了。

难道除了尖叫外，打工妹们别无出路？

伤的自白

慧的尖叫不管如何也是一种力量，沉默的晓却让我们忐忑不安。对于她出来打工所受的伤害，她久久不能言说。

在珠海，晓进了一间有一千多人的塑料花厂。车间的工作环境很差，由于做塑料材料要不时地烧熔塑料，再加工成不同类型的成品，因此车间里的温度很高。晓说：“经常会有危险，比如熔融的塑料落下来会把人烫伤，或者是在加工花叶时将手粘住；厂方没有安装空调，在高温作业环境下我们十分辛苦，但是这个车间的工资要比其他的高一些，多苦我们也要撑下去。”

可是，工作安全始终是一个问题。晓进了那间工厂，短短一个月内就有两名工人被机器轧伤手。

“我们车间里经常发生工伤事故，她们的工作都是要用手把模具放进啤机（又名裁断机）内，有时工人没装好就按下按钮，手被轧到了；有时模具和机器也会失控，轧到工人的手。我刚去的一个月就有两名工人受伤，其中一个女孩刚上班不久，手就残废了。后来，一个老乡做了二十多天就被轧到了小手指，只好拿着一个月的工资回家了。”

阿秀同晓的经历一样，进了一间生产电动马达的台资工厂。她原觉得这家工厂很不错，没想到这家工厂给她的一生带来了抹不去的阴影。

“我的工作负责装配马达的零件。厂里的管理并不严格，我做得很轻松，也很高兴。厂里的生活条件也不错，12个人一个宿舍，每个宿舍都有热水、冲凉房，每个人还有一个衣柜，厂方还给工人发被子、碗、筷等。”

阿秀的工作是操作机器，即将零件送入台钻钻孔，用手和脚踏着开动机器。早在20世纪60年代，那些机器就已被西方国家淘汰，但阿秀却在操作着，她说：“马达里面的那个零件上面本来有一个小孔，只要在机器上钻大一点就行了，好像不是很危险。事先厂方没有对工人进行任何安全培

训，只是告诉我们怎么操作。那天我把零件放进去，可是机器失灵了，砸到了我的手指。”

“我刚到那个岗位才两天就出了事，组长很害怕。那时我差一点昏倒，但我知道手指没有掉下来，一直在流血，整个手已经麻木了，没什么感觉。坐车到了医院，身边没有什么亲人，就听厂方的安排，截掉了手指。”

失去一节手指的阿秀很难过。“我想这下可完了，手都断了还有什么用，以前在家里父母邻居都很喜欢我，村里只有3个女孩子和我学历一样，找男孩子也可以挑别人；现在变成这样子，还说什么去挑人家，不知道能不能嫁出去。当时我很委屈，天天哭，好想见到自己的亲人。”

和许许多多的工伤者一样，阿秀进厂打工几天就受伤，年近婚龄的她自此变得寡言、孤僻和自卑。

争取权益主体

打工妹之所以能被招进工厂不仅仅因为她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外来工，同时也因为她是一名女性，是被认为价格更加便宜，而且更加容易管理和控制的女性。在中国，外资厂经常被比喻为桃花源，那里的少女们正在等待着男性们的追求。生产机器对普遍性的人没有兴趣，它只对特殊的人，即女性才感兴趣。因为女性通常被想象为更加驯服、忍耐和适应工厂机器。

然而，作为一个打工主体，打工妹是自身主体化过程与社会对主体进行塑造的力量相抗衡，以争取“行动者回归”而生成的一个主体。中国打工妹希望将自身从长期的隔离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欲望，正好碰上企图控制打工者身体的资本规训权力，因此，打工者将作为行动者展开行动来改变

自己的生活。

尖叫和梦魇，并不是打工妹作为主体进行反抗的唯一策略。会尖叫的慧，同时也会参加工厂宿舍内的集体行动，她进入深圳宝安的一间电子厂不久，便遇上了怠工事件。慧忆述，当时那间工厂每月扣工人150元的伙食费，但伙食却很差，都是一些烂菜。“最便宜的菜才给我们吃，大饭堂里面菜很脏，像猪吃的一样，而且是青菜炒虫，菜里全部都是虫子。”慧由于不满意伙食，草拟了一封信，要求厂方改善伙食，并且在宿舍内发动其他打工者签名，结果反应不好。不少女工因担心被炒，所以那封信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女工的不满仍是存在的。

伟珍是一位来自河南的打工妹，比起慧，她有更多的集体争取经历。伟珍本来是一间电子厂里的装配工，在流水线工作。除了不停地超时加班工作外，还要受主管的责骂。伟珍回忆说：

“她(主管)以前也是与我们一个车间的，以前管一条生产线，后来她管整个车间的两条生产线。因为她的管理方法不对，以权压人，很刻薄，我们都不愿让她做主管，所以我们投诉她，想把她炒掉或调走。我们几个员工闯进生产办公室去讲理，但经理态度很恶劣，瞪着眼，讲话也很没水平，凶巴巴地说他是皇帝，我们没资格与他讲条件。我们说，我们打工的是来厂做事的，是有头有脑、有思想的，并不是天天被骂的。”但是，跟经理反映后没有任何回应，结果，伟珍想出了以怠工的方法来反抗那个主管。

“因为我们那条线是第一道工序，也就是插件，第二条线是执锡，第三条线是组装，若是我们有半天或一天不上班，工厂就不能生产了。我们这条线有几十个人，人也比较

齐心，我在线上是坐第一个工位的。大家一传一，吃完饭就已经商量好，如果不加班就全都不加班。我们就是晚上怠工，白天不会的。”

后来，她面对的是工厂搬迁的问题。这一次，她又采取了怠工行动。

“当时厂方搬厂到关外的公明镇某村，并且逼迫员工，不想搬也得搬。厂方说，关外开发了一个新的工业区，有很多厂房，都是一流的，好像是想把我们骗过去。一部分还是搬去了，而我不想去，因为关外太偏僻了，治安也不好。整家厂的四五百人，只有二百人左右过去了。”伟珍回忆道。

由于不想去关外的工厂，她们开始辞工，但厂里不允许辞工，非要她们一起搬到关外去，否则就不给工资。她们没办法了，又不忍自己的血汗钱白白丢掉，于是，她们给劳动局送去了投诉信，并且亲自去了劳动局投诉。

提起去劳动局的经历，伟珍记忆犹新：

“我们一大群人，几人一组，分头出发。一组去区劳动局，一组去市劳动局，一组去区政府，还有一组去了特区报。我还是个代表呢！那时我们选了3个代表，我们去劳动局时，由于人多就只让我们3个代表进去了。劳动局的职员问我们这么多人来干吗？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事。当时不是很怕，唉！怕也没办法，就是怕，也要装出不怕的样子，为了争取权益，自己为自己打气吧。”

对于打工者的地位和意识，伟珍很是清楚的：若是不去投诉的话，我们的工资就会白白地丢掉了。

未能完结

打工妹,作为一个以各种形式的合作、反抗以及挑战为特征的特殊底层阶级,体现了支配与反抗这个双重过程,它们共同创造出这个复杂、叛逆而异质性的主题。打工妹是复杂、叛逆而机灵的主体,她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全能的支配体系,而且她们懂得应该如何权力和纪律的网格缝隙中进行反叛。无论打工妹们怎样无权,她们都不单只是“驯服的身体”。相反,她们是“机灵而反叛的身体”,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对抗着霸权。我并无意要将这些生活实践或争取活动传奇化,但是,工厂女工们的故事与体验,疼痛与煎熬,尖叫与梦魇交织在一起,的确构成了一幅打工阶级“反叛的政治学与诗学”的生动画卷。

与西方的无产阶级化道路不同,中国的打工妹没有对资本展开过有组织的公开对抗,也没有能够成为一股重要的反抗力量。外来工们作为城市过客的两个重要特点——无常和游离,也给他们在城市中成长为一股集体性的阶层力量设置了障碍。但是一有机会,打工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各种短暂的、自发性的集体行动。在对抗性集体行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会导致各种反叛性集体行为的产生和蔓延,从一般的劳动反抗,一直到日常生活的争取活动。

简而言之,打工妹这个特殊的打工主体不仅体现了生产关系,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和文化关系、消费关系、社会网络、家庭关系以及争取活动。如果说,传统的阶级主体是一个将自己外化于他人的他者化的结果,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抽象形式,那么,这个新的打工主体则是“行动者的回归”的实现。从这个实现开始,一个人决定以集体的或者个体的方式

采取行动。这是对自我的坚定回归,对主体权利的掌控可以使其于强权之中捍卫自身。打工妹是女性的打工主体,她们的争取活动不应该被简化为传统的“阶级斗争”,因为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界定的那种工人斗争。她们的争取活动既是打工者对不公平的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挑战。